

中国经济增长 1952—2013: 加速或减缓[※]

李 静¹ 楠 玉² 江永红³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借助艾肯格林设定经济增长减缓和加速需要满足的条件,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第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经过阶段性加速增长之后,加速过程在2003年开始向中西部区域转移,并且发达和沿海省区的增长趋于稳态;第二,中西部省区继续表现出持续的加速过程,中西部的增长潜力将是引致整体经济稳定增长的引擎;第三,基于国际增长经验和当前中国增长态势判断来看,中国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需要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年保持相对稳定增长。

[关键词] 新常态; 经济加速; 经济减缓; 增长质量

一、引 言

经过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于2012年首次告别2位数的增长,进入次增长阶段,这被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1]近年来,经过中国经济运行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和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幅度也逐渐趋于稳定。由下图显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经历大幅度波动并逐渐走向平滑的过程,特别是自1995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趋势变动幅度很小,经济增长稳定,经济增长趋于“常态”。

关于经济增长的路径刻画,早期学者们仅采取观察的方式进行粗略的描述,比如经济周期理论(BCT)把经济增长路径特征表述为围绕潜在的经济增长趋势上下波动,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经历阶段性增长、停滞或崩溃过程。^[2]后来学者们采取实证的方法刻画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属性特征,目的去寻找经济增长路径中的独特方面。比如,Reddy和Miniou研究实际收入停滞问题,他们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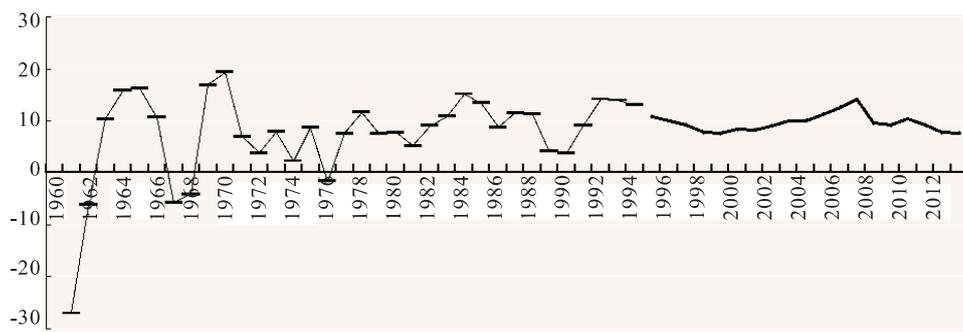
※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三重目标下我国货币政策优化与预期管理研究”(批准号:11&ZD011)的资助。

作者简介:李 静(1980—)男,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合肥 230601)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理论。

楠 玉(1988—)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博士生。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

江永红(1974—)男,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合肥 230601)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理论。

发现, 经济增长停滞主要发生在贫困、冲突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国家。^[3]而 Ros 和 Hausmann 则重点研究经济增长路径中的增长崩溃问题及其决定因素,^{[4][5]}并且 Eichengreen et al 认为经济增长崩溃比经济增长停滞更为典型。^[6]国内学者黄群慧基于考察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趋势时发现, 中国工业经济正走向速度趋缓, 结构趋优的增长“新常态”。^[1]刘伟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除此之外, 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7]



中国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

注: 本文 GDP 年均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 时间跨度为 1960—2012 年。

如上, 研究本质上是在刻画经济增长路径的属性特征, 而我们的目的则是寻找这些属性特征中最为“独特”的一面, 即经济增长过程中加速拐点和经济增长减缓拐点。正如 Hausmann et al 所言, 一个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 不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 我们最好的方式去理解经济增长路径及其属性特征就是去找到经济增长在什么时刻出现经济增长拐点。^[5]如果我们仅仅依据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动趋势, 而不是分析这个拐点, 那么我们只能看到经济增长的外在性质。同时, 依据增长加速原理, 经济增长只有经历加速过程才能扭转持续减缓的趋势, 因此找到经济增长路径在什么时间开始加速或者减缓, 并且以什么样的态势加速或者减缓对于正确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显得尤为重要。依据 Hausmann et al 和 Eichengreen et al 的研究可知, 一旦找到经济增长路径的加速或减缓拐点, 并且刻画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到下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增长过程, 所谓增长趋势属性的庐山外貌就能展现全景。^{[5][6]}

经济增长加速(acceleration)或减缓(slowdown)定义为在经济增长阶段突然持续偏离预期的增长路径。^[8]本文的研究就是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减缓或增长加速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 进而寻找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在何时经历加

速或者减缓，并且刻画二次拐点之间经济变动所呈现的特征。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借助数值化界定的方法，基于不同维度刻画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相比之前学者采用单维度的方式更为准确；第二，本文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增长拐点特征，转变了以往普遍依据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动趋势来预测经济的分析方式。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阶段性增长特征事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几个重要经济变迁过程：

第一阶段：1949—1978年。1949年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第一是改变了社会政治秩序，第二加快了经济增长，第三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自1952—197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加速，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变使得GDP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0%。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并没有沿着稳定持续的增长路径变动，经济增长频繁变动。其根本原因为：第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冲击着经济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先后经历了所有制形式的变动，但同时也经历了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破裂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自我创伤。第二，生产规模过于庞大，而生产规模的随意更改使得经济增长不稳定性。比如，1957年1.3亿户家庭农场在1958年被改造成260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6700人。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同时，生产规模在工业和服务业也同样强调大型化。不仅如此，在过分强调生产规模的同时，政府政策性也在随意更改生产规模，这又使得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内部增长环境。第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力量极其微弱，政府主要依靠指令和规定对各种资源进行分配，其结果就是拥有庞大的存货却忽视消费者的福利，与此伴随的就是生产率低下的同时，增长不稳定。

第二阶段：1978—2003年。由于改革时期的成功政策，比如，土地控制权和经营权转向农民的政策、发展小规模工业政策、实施与世界接轨政策等，中国人均收入在1978—2003年以每年6.6%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了欧美国家1.8%的增长速度。中国人均GDP从世界平均水平的22%上升至74%，占世界GDP的份额由5%上升至15%，这使得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并非呈现稳定的态势，尽管1992—2000年经历了8年的高速稳态的经济增长过程，但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也很不稳定，主要表现在引致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第一，存在大量的低效率国有企业，并且大部分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这些国有企业完全依靠政府补贴和向国有银行拖欠才得以运营。第二，改革初期脆弱的金融体系。尽管改革初期出现了居民储蓄的爆炸式增长和经济的迅速货币化，但是该时期的金融体系是不稳定的，并且存在大规模的不良贷款。第三，改革初期虚弱的财政地位。从1978—1995年，政

府的税收由占 GDP 的 31% 降到了 10%。同时,由于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税赋优惠,以及国有企业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纳税基础。这种虚弱的财政地位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公共和教育设施的建设。除此之外,能源与环境问题、法律制度和私人产权问题以及地区间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都是影响经济不稳定增长的因素。

第三阶段:2003—2011 年稳定高增长时期。2003—2011 年是中国经济稳态高速增长时期,此期间经济增长率稳定在 10% 左右。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发展从“快字当头”到“好字优先”有序转化。10 年来,坚持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主要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内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第二,扎实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进一步显现;第三,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第四,完善落实区域发展政策,区域发展呈现良性互动态势;第五,注重改善民生,社会发展呈现和谐稳定的新气象。

第四阶段:2011 年之后新常态时期。2003—2011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10% 左右,而 2012 年和 2013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均为 7.7%。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预测 2014 年年经济增长率为 7.4%,未来 5 年预期增长率为 6.4% ~ 7.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预测 2014 年经济增长率为 7.5%,2015 年为 7.3%,未来 10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6.5% 左右。以上数据显示,10 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首次告别 2 位数的增长,进入次增长阶段,这被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1]

三、中国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的界定

(一) 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界定方法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会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但是关于经济增长通常在哪个阶段上减缓或加速的研究,成为考察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的关键。依据 Hausmann et al 和 Eichengreen et al 的研究可知,一旦找到经济增长路径的加速或减缓拐点,并且刻画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到下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增长过程,就能深入地刻画经济增长路径上的趋势性特征,^{[5][6]}这也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形势,有助于设计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本文的研究就是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减缓或增长加速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进而寻找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在何时经历加速或者减缓,并且刻画二次拐点之间经济变动所呈现的特征。我们主要借鉴 Eichengreen et al 和 Aiyar et al 关于增长加速和增长减缓的界定,^{[9][8]}同时考虑本文重点关注中

国以及各省的经济波动情况，放宽对人均 GDP 增长率的约束。界定经济增长减缓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为如下三个维度：

$$g_{t-n,t} \geq \Gamma, \Delta g = g_{t-n,t} - g_{t,t+n} \geq \Lambda, y_t \in [y_1^*, y_2^*] \quad (1)$$

其中， g_t 为依据 2005 年不变价格测算的 GDP 增长率， $g_{t-n,t}$ 和 $g_{t,t+n}$ 分别表示 $t-n$ 到 t 以及 t 到 $t+n$ 时间段年间 GDP 年均增长率的平均值。考虑到很少国家连续 7 年经济加速增长或经济减缓增长，因此我们取 $n=7$ 。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减缓之前的 7 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 Γ ，为了能获得较多的经济增长减缓拐点，借鉴 Eichengreen et al 设定，^{[10][9]} 我们把 Γ 定为 3.5%；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减缓下降的幅度要不低于 Λ ，表明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之后出现经济转型期，同样，为了能够获得经济增长拐点，我们把 Λ 取值为 2%；第三个条件限定增长减缓发生在某一收入区间内，考察经济增长进入一定的收入门槛之后是否发生经济增长转折。同理，筛选出的增长加速的时间点必须满足的条件为：

$$g_{t,t+n} \geq \Gamma, \Delta g = g_{t,t+n} - g_{t-n,t} \geq \Lambda, y_t \in [y_1^*, y_2^*] \quad (2)$$

其中：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之后的 7 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 3.5%；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上升的幅度不低于 2%；第三个条件表明从一个加速拐点到下一个加速拐点，增长加速发生在某一收入区间内。

（二）计算出经济增长路径减缓和加速时间点

由于中国当前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所以我们放松对收入的约束。考虑到 Eichengreen 的设定（ $\Gamma = 3.5\%$ ； $\Lambda = 2\%$ ）对跨国数据分析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9] 因此，我们以此为依据，借助全国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筛选出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时间点见表 1。本文 GDP 年均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1952—2013 年。

由表 1 可以看出，自 1952—2013 年共计 62 年内，我国经济增长经历 10 次经济减缓拐点和 12 次经济加速拐点。这表明，我国经济波动增长的同时，多次经历加速增长或者减缓过程，经济增长波动的惯性较大。这表明，我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多次采取权宜之计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使得经济频繁的加速或减缓增长。简单地说，刺激经济的措施可以使经济发展速度慢的经济体变得更快，而发展速度快的经济体则会面临增长减缓。在单一经济体中，单纯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不一定能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期间，尽管会出现就业率、GDP 等经济数据的趋好，但并不能在较大程度改变整个社会需求，生产力也并没有实现真正提高。而且甚至还会给经济体造成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物价暴涨、产能过剩，甚至是经济危机。这样的增长只会产生短暂的虚假繁荣的假象，并不能使经济体产生持续的增长动力。并且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经历 3 次连续的减缓过程和 4 次连续加速过程，分别为 1958—1960 年、1970—1971 年和 1996—1998 年的连续增长减

缓拐点, 以及 1977—1980 年、1982—1983 年、1991—1992 年和 2002—2004 年的连续增长加速拐点。这表明, 当加速经济增长的刺激过后, 如果没有持续的稳定增长动力之源,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增长连续减缓。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为 3583.38 美元。根据国际增长经验, 当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 GDP 为 1000 美元的“贫困陷阱”后, 很快会奔向 1000~3000 美元的“起飞阶段”, 但到人均 GDP 为 3000 美元附近, 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 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 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 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 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该增长区间内, 能否顺应当前增长减缓的趋势, 通过转方式、调结构顺利进入下个增长阶段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

表 1 计算出增长减缓和加速时间点

减缓时间点					加速时间点				
y	g	g	t	频数	y	g	g	t	频数
-	21.3	6.08	1958	10 (62)	109.4515	-4.1	-2.266	1968	12 (62)
-	8.8	7.96	1959		176.954	7.6	-3.457	1977	
124.692	-0.3	5.41	1960		195.031	11.7	-3.872	1978	
144.593	19.4	3.128	1970		207.072	7.6	-3.586	1979	
150.522	7	3.552	1971		220.442	7.8	-3.771	1980	
172.065	8.7	2.715	1975		246.136	9.1	-4.715	1982	
846.871	10	2.1	1996		269.049	10.9	-2.214	1983	
916.204	9.3	2.886	1997		498.832	9.2	-2.629	1991	
978.237	7.8	2.572	1998		562.727	14.2	-2.329	1992	
2403.314	9.6	2.314	2008		1307.651	9.1	-2.357	2002	
-	-	-	-		1429.485	10	-2.371	2003	
-	-	-	-		1564.543	10.1	-2.314	2004	

表 2 为计算出我国经济增长路径高增长中的加速阶段和低增长 (中等增长) 中减缓阶段的特征数值。计算结果显示, 1952—2013 年, 我国经历 4 次低增长或中等增长中的减缓阶段。分别为 1957—1970 年, 持续时间为 14 年; 1971—1975 年, 持续时间为 5 年; 1975—1996 年, 持续时间为 22 年和 2011—2014 年, 持续时间为 4 年。同时,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经济增长也经历 4 次高增长中的加速增长阶段, 分别为: 1968—1977 年, 持续时间为 10 年; 1983—1991 年, 持续时间为 9 年; 1992—2002 年, 持续时间为 9 年; 2002—2011 年, 持续时间为 9 年。根据稳定增长的界定, 在经济减缓区域中, 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小于或者等于 3 的只有 2 次, 分别为 1971—1995 年和 2011—2014 年。这两次经济增长减缓属于稳定增长的界定范围, 其中 1975—1996 年属于低增长稳定状态, 2011—2014 年属于中高增长稳定状态。同时, 在经济加速区域中, 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小于或者等于 3 的也有 2 次, 分别为 1992—2000 年和 2002—2011 年, 它们属于经济高增长稳定状态, 其中

2002—2011 年区间的增长稳定性更为明显。

表2 经济增长发生二次拐点的时间长度及稳定性

低增长或中高增长区域 (减缓区间)				
时间跨度	1957—1970	1971—1975	1975—1996	2011—2014
持续时间	14 年	5 年	22 年	4 年
波动幅度	14. 93	2. 75	4. 08	0. 89
是否稳定增长	否	是	否	是
高增长区域 (加速区间)				
时间长度	1968—1977	1983—1991	1992—2000	2003—2011
持续时间	10 年	9 年	9	9 年
波动幅度	7. 34	3. 86	2. 46	1. 68
是否稳定增长	否	否	是	是

四、经济加速增长区域转移和国际增长经验比较

(一) 经济加速增长区域转移

表3 中国加速过程区域转移情况

发达及沿海地区					
省区	2003 年之前 加速过程	2003 年之后 加速过程	省区	2003 年之前 加速过程	2003 年之后 加速过程
北京	14	0	江苏	16	0
上海	12	0	浙江	18	0
广东	20	0	全国	10	2
中、西部省区					
省区	2003 年之前 加速过程	2003 年之后 加速过程	省区	2003 年之前 加速过程	2003 年之后 加速过程
辽宁	14	3	湖南	12	4
吉林	15	4	广西	17	4
黑龙江	19	3	福建	18	4
安徽	19	4	四川	16	4
江西	15	4	贵州	17	4
河南	16	3	云南	14	4
湖北	18	4	陕西	19	4

注：表中数值为加速拐点频数。

表3 计算出各个省(市)区 1952—2013 年经济增长路径的增长加速拐点频数及其加速过程区域转移情况。表3 中的计算结果显示,整体上各个省(市)区经济增长路径上都经历频繁的加速过程。但是,对比而言,在 2003 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加速过程发生区域转移。发达和沿海地区的增长加速期消失,经济增长趋于

稳定，但是中、西部省（市）区依然出现持续增长加速阶段。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加快。2007年，西部经济增速首超东部。次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全面加速，均超东部增长水平。截至2009年年底，中、西部和东北同比分别增长12.6%、13.4%和11.6%，已经比东部分别高出1.9个、2.7个和0.9个百分点。这表明，在今后的几年中、西部和东北经济增速全面超东部已无悬念，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已经从沿海和发达省区向中、西部省（市）区转移。这一特征事实的具体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是重要动力之源。主要表现为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制造业正在加速向中、西部转移。经过一段时间产业梯度的持续转移之后，东部省区留下的是以轻工业、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为主，这一类产业增长速度不及工业高，从而表现在东部省区增长速度不及中西部省（市）区的增长速度。

第二，伴随中、西部经济增速加快，我国经济重心也在不断演变。首先，中、西部地区所占GDP份额不断提高，并呈现不断递增的趋势。截至2009年，中、西部地区所占GDP份额已高达46.16%。其次，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引力不断增强。2010年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比重由11.2%上升到13.7%，到2013年，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速已经超过东部地区。与此同时，赣、湘、川、渝、豫、吉等一批内陆开放高地正在形成，这种内在驱动力进一步引致中、西部地区外资引力的加强。目前，境内外资本正加速流向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呈加速趋势。

第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是中、西部经济加速增长的切入点。中、西部拥有资源优势以及人力成本低于东部的优势，这些比较优势使得中、西部省（市）区能够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内在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如此，中、西部省（市）区也不断加快人才培养，实现人才供需的有效对接，又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高铁的飞速建设又拉近了中、西部省（市）区与东部市场距离，缩短了城市间的交通距离，改变了城市间的空间结构，进而带动了中、西部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四，除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政策优势外，加速协调发展政策也是经济加速增长向内陆省（市）区转移的又一原因。目前，我国区域发展增长格局，从东部地区“一马当先”，向中、西部地区全面加速、各区域协同并进转变。我国地区差距逐渐缩小，区域协调发展呈加速态势。与此同时，在“十二五”、“十三五”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大背景下，我国将加快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将给中、西部加速增长带来新的机遇。

（二）国际增长经验比较

通过对中等收入阶段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典型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

龙”)的经验借鉴,以及仍在中等收入阶段摸索但增长领先于中国的国家(如东南亚、拉美和“金砖”部分国家)发展路径的总结,可以更清楚地认清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问题大有裨益。因此,我们以美国和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为参照系,结合东南亚和拉美部分国家,同时考虑中国增长基数较低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均GDP还不足100美元),因此我们加入博茨瓦纳和赤道几内亚两个起点较低同时增长较快的国家,通过对这些国家出现经济连续减缓时对应的增长率和收入水平进行分析和归纳,为中国应对当前增长问题提供参考。

表4 不同国家(地区)发生连续减缓的时间和对应的增长率水平

1960s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新加坡(5) 博茨瓦纳(6)		中国(3)	赤道几内亚 (10)	11~13%
	中国(3) 韩国(6)	韩国(4) 博茨瓦纳(7)		10~11%	
	巴西(5)	中国香港(2)	泰国(6) 马来西亚(6)	中国(3)	9~10%
	日本(7)		韩国(4) 新加坡(6)		8~9%
	巴西(4)	马来西亚(3)	智利(7)		7~8%
南非(5)			中国香港(4) 阿根廷(3)	俄罗斯(4)	6~7%
	阿根廷(3)	哥伦比亚(3)	中国香港(4)		5~6%
美国(3)	智利(6)	美国(2)	日本(5) 乌拉圭(4)	哥伦比亚(3)	4~5%
		乌拉圭(4)		美国(8)	3~4%

注:括号内数字为减缓拐点频数。

表4计算出各个国家(地区)发生连续减缓对应的时间区间和增长率水平。整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多数国家(地区)集中发生了连续增长减缓,但发达经济体经历连续增长减缓次数较少,即使发生也多集中在跨入高收入门槛之后。如:美国198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其连续增长减缓集中于21世纪初期;日本1986年跨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连续增长减缓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于1990年先后成为高收入国家(地区),连续增长减缓发生于1993年以后。同时,这些国家(地区)在跨入高收入门槛前10年,增长均相对平稳。如美国、日本及新加坡在此期间均未经历减缓过程,中国香港虽然之前一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但此期间仅经历了2年的增长减缓期。近期有望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巴西和马来西亚,其连续增长减缓也分别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而进入21世纪后均未发生过增长减缓。由此可见,要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必须保持经济增长的相对稳

定,避免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2013年,中国人均GNI达到6560美元,与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门槛12475美元仍有较大的距离。当前中国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高速增长之后,于2008年开始出现增长减缓拐点,并且预测2015年还会出现减速拐点,^[6]这将使得中国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变得相对困难。因此,需要寻找“新常态”下引致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之源,积极推动经济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保持进入高收入阶段前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经过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面临高速增长常态到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的阶段性转变。本文借助艾肯格林设定经济增长减缓或加速需要满足的条件,通过不断调整约束方程,寻找二次拐点之间经济增长变动所呈现的规律,进而刻画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从中长期经济增长路径分析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加速拐点和减缓拐点是频繁的,并且出现过连续的经济增长加速过程和减缓过程,这种加速和减缓的不断交叠使得中国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呈现大幅度的波动态势。第二,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过程发生区域转移,沿海和发达省区在2003年之后增长加速过程逐渐消失,经济增长趋于稳定,但是东、西部省(市)区加速增长过程依然明显,中、西部潜在增长动力将是引致整体经济稳定增长的引擎。第三,得益于较长时期的加速增长过程,中国才能够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态势。但是,借助国际经济增长经验比较发现,中国要想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需要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年保持相对稳定增长。

就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判断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追赶空间。首先,从人均GDP增长率来看,如果假定人均GDP增长率每十年以1%的平均速度递减,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7.5%,在2014—2024年为6.5%,而到2024—2034年约为4.5%。按照这个假定,中国将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到2030年经济总量相当于世界GDP的1/4。但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只达到西欧和日本1990年后的水平,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依然悬殊。其次,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后,大规模的经济赶超,比较优势的发挥已经逐渐失去动力,随着整个经济态势的变动,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前沿也会进一步外移。这意味着技术模仿成本变得更大,用创新取代模仿将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和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动力,而创新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过程。最后,中国经过增长拐点之后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可能会减小。日本和韩国经济均在拐点出现之后的十年遭遇严重的危机,能源和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使他们永久性地放慢了增长速度。^[11]考虑到未来十年中国对原油依赖性的日益增加和

对外依存的显著存在，当外部随机因素冲击时，中国有可能具有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增长减速情况的发生。因此，我们需要结合“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抓住下一个稳定增长的关键时期。☆

主要参考文献:

- [1] 黄群慧. “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 (10): 1-13.
- [2] Pritchett, Lant. Understand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Searching for Hills among Plateaus, Mountains and Plains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1, 14: 221-250.
- [3] Reddy, Sanjay and Camelia Miniou. Real Income Stagnation of Countries, 1960—2001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9, 1 (45): 1-23.
- [4] Ros, Jaime. Divergence and Growth Collapse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Jose - Antonio Ocampo (ed), Beyond Reforms: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 [J].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1-232.
- [5] Hausmann, Ricardo, Lant Pritchett and Dani Rodrik. Growth Acceleration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5, 10: 303-329.
- [6] Eichengreen, B., Park, D. and Shin, K. Growth Slowdowns Redux: 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 - Income Trap [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3, No. 18673.
- [7] 刘伟, 苏剑. “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 [J]. 经济科学, 2014 (4): 5-13.
- [8] Aiyar, Shekhar, Romain Duval, Damien Puy, Yiqun Wu and Longmei Zhang. Growth Slowdown and the Middle - Income Trap [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2013, 4: 13-71.
- [9] Eichengreen, B., D. Park, and K. Shin.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J].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12, 11: 42-87.
- [10] Eichengreen, B., Yeongseop Rhee and Hui Tong. The Impact of China on the Exports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2004, No. 10768.
- [11] 王庆, 章俊, Ernest Ho. 2020年前的中国经济: 增长减缓不是会否发生, 而是如何发生 [J]. 金融发展评论, 2011 (3): 26-36.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rom 1952 to 2013: Acceleration or Slowdown

Li Jing¹ Nan Yu² Jiang Yonghong³

Abstract: Through the requirements of growth slowdowns or acceleration which are set by Eichengreen and constantly adjusting the constraint equations, this paper pursues the trend characteristics on the economy growth path.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is paper, the following main conclusions are: First, after 2003, the acceleration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egan to shift from the developed coastal provinces to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its economic growth tends to be stable. Second, the acceleration process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is still obvious,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will be the new engine of China economic growth. Third, with the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experience, we found that, China must have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growth at least 10 years before entering the stage of high-income.

Key words: New Normal; Economic Acceleration; Economic Slowdown;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收稿日期: 2015.5.5 责任编辑: 陈健生]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306 (2015) 07-0039-11